

共享单车需要制度供给优化

方翔

新民眼



孙绍波画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中,共享单车市场出现了“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智能无桩共享单车模式”入选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风光无限;另一方面,酷骑、小蓝、小鸣等单车企业却面临着“押金”难以退回的窘境,在街头出现了大量“僵尸车”。一年的时间,共享单车跑完了其他行业需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路程。在此情况下,共享单车如何才能更好展现其应有的创造力,成为推动绿色出行的“发动机”,而不是城市管理的“累赘”呢?

在近日举行的十一届市委三次全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多次提到共享单车爆发出的企业创造力,要求官员们重视其创新意义。

2016年以来,不少城市将对共享单车的监管提上日程。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先后发布了有关共享单车监管的征求意见稿、指导意见或管理办法,如《上海市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见(试行)》中就提出要完善车辆的管维机制:共享单车企业应在本市配备与车辆投放规模相适应的服务网点和管维人员,建立健全运营管理、巡检维修、安全保养、报废回收等机制……

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共享单车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

就在于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存在“制度真空”。就以最为大家诟病的共享单车乱停放来说,马路上的共享单车究竟是属于交警还是市政部门,而在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又该由谁来管呢?即使是正常停放的共享单车,由于长期无人骑行而成为了“僵尸车”,又应由哪个部门清理,是环卫部门,还是市容部门呢?这些问题仅靠现在的制度很难找到答案。只有用制度供给来堵住这些“漏洞”,消除不应有的“制度真空”,才能让

共享单车运营感受到城市管理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让消费者感受到绿色出行的便利、安全、有序。

优化制度供给首要在于全面依法治市,使法治成为“上海制度竞争力的核心标志”。上个月,摩拜单车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要求被告立即停止在车上擅自安装和发布车座套小广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因其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并公开发布声明以消除不良影响。

此举也被业内认为是共享单车向“牛皮癣”顽症正式“宣战”。

共享单车上广告品种繁多,既有健身、贷款等商业广告,也有办证刻章、B超性别测验、出售考试答案等非法小广告,损害了城市的形象。而对这些不良商家来说,1000张不干胶的小广告只需要300元,5000张只需500元,甚至比一般的纸质传单更便宜,还不容易被清除,违规违法成本相当低,虽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类似封号等手段,但

效果并不理想。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关键要在“精治、共治、法治”上下功夫。对于这些流动的“城市牛皮癣”,共享单车运营者应该是第一责任人。这些在城市流动的自行车,其产权是属于企业的,对于车辆本身的状况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不能投放之后就听之任之。企业应该坚决清理违法违章的流动“牛皮癣”,并向有关部门及时汇报相关情况。同时,企业也要鼓励骑行者予以举报。据悉,摩拜单车已经推出共享单车行业首个“小广告举报专线”等,对违法企业采取多种措施,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促进共享单车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良好的城市形象。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共享单车企业对发布小广告的企业发起“宣战”,以开放胸怀和创新方法,让各类社会主体充分参与相关事务,真正体现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真谛。

共享单车的诞生是要通过更便民的方式,推进绿色出行、缓解交通拥堵,让自行车这一环保出行方式回归城市,这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因而需要用制度供给的突破和优化,为共享单车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面对共享单车这样的新模式、新理念,我们必须学会抛弃旧观念、老办法,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和法治化。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国华印刷所: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印刷机构

香兴里燃起红色传播之火

传承 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马丹

老闸北的临山路不过300余米长,但要探寻国华印刷所遗址却不易。印刷所曾在的香山路香兴里已被日军炮火摧毁,现如今的原址处、宝昌路临山路路口附近,也因时代变迁只留下城市发展的印迹。

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印刷机构,国华印刷所燃起的红色传播燎原之火,却不会跟着往事随风而去,早就成为党的历史里短而有力的一笔。

红色印刷迫在眉睫

今天,我们站在宝昌路临山路路口,试着抹去公寓住宅等现代景观,想象第一代红色出版人在香兴里中紧张忙碌的情形,仍会热血沸腾。近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创建初期。当时,党并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大部分的文件主要靠油印发行,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则由较为进步的印刷厂代为印刷。

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尤其是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人民群众对革命思想的渴求,让启蒙文件和书刊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开办自己的印刷厂迫在眉睫。其实,早在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就已决定党团联合组成中央出版委员会。在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



决定了以上海书店为中心,逐步建立起全国革命书刊的发行网,这也为印刷厂铺垫了良好的发行基础。

一个厂址两块牌子

老革命人史唐曾撰《忆中共早期地下印刷所》一文,回忆其作为最早一批红色出版人,在沪创办印刷所的经历:当时,在上海负责出版发行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徐梅坤和上海印刷工会的郑复他,推荐浙江杭州的印刷工人倪忧天来负责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下印刷所——国华印刷所。接到任务的倪忧天,立刻召集了几位党团员和年轻、进步的印刷工人来到上海,其中就有刚满15岁的史唐。1925年6月,几经考察,印刷

专家点评

不畏艰险 播种革命思想

1925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五卅运动时势发展之需,成立了国华印刷所,这是中共第一家秘密印刷机构。倪忧天等印务人员负有特殊使命,他们辛劳忙碌的身影,伴随着轰鸣的机器声,伴随着时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正是因为他们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使得“刊物与传单是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口中吐出来,成捆地运送”,使得革命思想与情绪“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地播种”;于是,五卅之际“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迅猛发展。重视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中共亦始终善于宣传而著称。如今,国华印刷所的旧址虽已不复存在,其功绩却成为永远矗立于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李璠(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淞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中国青年》曾在国华印刷所印刷发行

资料图

所最后选定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香山路香兴里。此地偏僻,不易引人注目。据史唐回忆,因倪忧天曾与上海闸北明精印刷机器厂和一家铸字厂有过交往,所以在这幢一正两厢三开间的旧式石库门房子里,印刷厂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为避人耳目,印刷厂同时挂上了“国华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务局”两个牌子。对外,这是两个机构,名义上崇文堂印务局对外营业,国华印刷所只是其特约加工印刷厂;对内,则有统一领导,印务局由上海书店的领导人毛泽民、徐白民、徐梅坤三位负责,委派倪忧天和陈豪干为正副负责人。如此一来,一旦发生问题,崇文堂印务局会出面承担责任,国华印刷所则可

以负责,从而争取保全印刷所财产和不连累职工。

设备简陋信念坚定

在党的红色秘密设施里,印刷所其实是最难隐藏的设施之一。“一来印刷机器声音很响。二来印刷品不易立即销毁躲避搜查。”即便如此,国华印刷所仍如火如荼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史唐在文中回忆了工作场景:“当时,所里的设备只有一部对开机,一部脚踏圆盘机,一副老五号宋体的铜模和三四号字头的铅字等。印刷所的总负责人是倪忧天,陈豪干负责排字房的工作,徐经坤负责印刷车间的工作,由我负责铸字房的工作。”印刷所人员并不多,但这群热

血青年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革命话题和燃不尽的学习精神。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可以最先接触革命文件和书刊作者的手稿。“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还能不时地接触到一般人很难见到的党团中央领导人,如陈独秀为修改和核对自己的手稿不时到我们所里来,当时全所的人都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头。《中国青年》的编辑恽代英、《向导》周刊的编辑郑超麟等,为排印和对样稿也经常和我们接触。”史唐回忆道。

铅字点燃燎原之火

当时上海正处于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之中,国华印刷所配合形势,快马加鞭地刊发各种书刊文件,特别是时间性很强、被动当局公开查禁的印件。同时,全体人员还要确保印刷所的安全,每次下班,所里都会派专人做好准备,防止和应付反动军警的骚扰破坏。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1925年9月,交通员在送党内文件校样至中共中央组织部途中,遭遇巡捕搜身。虽然交通员丢弃了印刷品,但倪忧天、陈豪干为防印刷所被查封,立即停工。该年10月,由毛齐华主持拆卸全部设备,转移至别处。

国华印刷所自创办到停办只有短短的5个月,却犹如黑暗中一点星火,点燃了红色启蒙的火苗。它先后承印了五卅运动宣传品、上海总工会的小册子、马列主义书籍、各种传单、公告和党内刊物等,其中有《向导》《向导丛书》《中国青年》《平民课本》《新社会观》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回顾中共早期革命印刷,国华印刷所其实从未真正“停工”,而是有了无数的继任者,让星火继续燎原。